臺灣社區矯治法制的建構 —與大陸社區矯正法的對照

王紀軒*

目 次

- 壹、前言
- 貳、社區矯治與社會安全
- 參、大陸社區矯正法的立法重點
 - 一、以社會復歸為目的
 - 二、個別化的矯正方案
 - 三、避免發生歧視排擠
 - 四、有效應用現代科技
- 肆、臺灣社區矯治法制的規範建議
 - 一、宜制定社區矯治專法
 - 二、妥當的社區矯治計畫
 - 三、充沛的矯治人力物力
 - 四、科技監控的謹慎應用
- 伍、結語

摘 要

在臺灣，強化社會安全網，是政府的重要政策。社區矯治，有助於罪犯的再社會化，以及社會治安的維持，能發揮強化社會安全網的作用，可惜並沒有受重視。相形之下，大陸相當重視社區矯正，並於2019年底完成立法，2020年7月施行。大陸的社區矯正法，以社會復歸為立法主軸，透過個別化的矯正方案，利用監管、教育及扶助措施，避免社會排擠受社區矯正人，並運用現代科技，頗值得臺灣參考。基此，本文對於臺灣的社區矯治法

* 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副教授。

制，提出些許政策建議。整體而言，建構適合臺灣的社區矯治專法，擴增執行社區矯治的觀護人力，對於臺灣社區矯治的長遠發展，應有助益；同時，也符合人民對於安全社會的期待。

關鍵詞：觀護人、更生保護、社區矯治、社會復歸、保護管束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Taiwan: Taking the China Mainland 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as a Reference

Wang, Chi-Hsuan^{*}

Abstract

In Taiwan,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Safety Net” is an important government policy. Community correction should help criminals return to society, protect social security, and can help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safety net. Unfortunately, Taiwan government does not pay attention to use community corrections. In contrast, China Mainl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use community corrections, and completed the legislation "PRC 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in 2019, which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July 2020. In China Mainland, 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the legislative goal is to use supervision, education and assistance to help criminals return to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avoid social repel criminals, and use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for community corrections. For Taiwan, it's worthy of reference. This paper advises on Taiwan Law: Taiwan needs to make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and increase the manpower of the probation. To develop community correction seriously, Taiwan society can be safer.

Key Words: Probation Officer; Rehabilitation Protection; Community Correction; Social Rehabilitation; Probation

^{*} Ph. D., Tunghai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壹、前言

社會安全，是當前政府重要的施政方針，自 2018 年行政院提出「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以「1. 家庭社區為基石，前端預防更落實。2. 簡化受理窗口，提升流程效率。3. 整合服務體系，綿密安全網絡。」作為施政目標，希望藉串聯跨部會的效能與服務，完備社會安全網體系¹。時至 2021 年，進入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的第二期²，政府將持續強化社會安全網，以回應人民對於安全社會的期待。

當前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中，社區矯治並未受到青睞；但是，社區矯治應是維持社會安全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安全網能否完善的關鍵之一³。所謂社區矯治，就是以社區作為矯治罪犯的場所⁴，並期待昔日的罪犯，經社區矯治的洗禮，悔過自新，順利回歸社會。臺灣的社區矯治，行之有年，但無制定專法，相關規定散見在刑法、保安處分執行法、更生保護法等，以及龐雜的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在此之中的主要規定是⁵，刑法第 41、42-1 條的易服社會勞動；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的宣告緩刑附義務勞務；刑法第 92、93 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64 條以下的保護管束；更生保護法的各種保護措施。

近年，海峽彼岸的大陸，相當重視社區矯正⁶，於 2019 年制定社區矯正法，2020 年 7 月施行。按照大陸官方說法，自 2003 年社區矯正試點以來，截至 2019 年 12 月，已經累積接受社區矯正人達四百七十八萬餘人，累積解

¹ 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58708ea0-f58d-48b0-9626-ae0571deec04>；（最後瀏覽日期：2021/05/20）

² 據媒體報導稱，「行政院今年將提出『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第 2 期（110 到 112 年）計畫，將檢討第 1 期（107 到 109 年）計畫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等 4 大策略並予以強化，對於外界關切的兒童受虐、婦女受家暴等問題，盼加強社會安全網的『網路』綿密合作，並進一步深化服務內涵。」見：自由時報，政院將提社會安全網 2.0 檢討強化 4 大策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441103>（最後瀏覽日期：2021/05/20）

³ 2020 年 10 月 21 日，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推社區矯治制度，完善社會安全網」。見：聯合報，監護處分 5 年「天花板」恐打破，2020 年 10 月 22 日 A14 版。

⁴ 張甘妹，論監禁刑的代替制度，臺灣大學法學論叢，14 卷 1-2 期，1985 年 6 月，15 頁；蔡德輝、楊士隆，犯罪學，6 版，2012 年 3 月，401 頁；許福生，犯罪與刑事政策學，初版，2010 年 9 月，459 頁。

⁵ 其他與社區矯治有關規定，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 條，對於付保護管束的性侵害犯罪者；又如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50 條以下，針對受社區矯治未成年人的保護處分。

⁶ 其實，社區矯正與社區矯治的意義相同，只是兩岸用語略有差異。用語上，大陸多統一用社區矯正；臺灣則有社區矯正、社區矯治或社區處遇等。為方便區分，敘述大陸法制時，用社區矯正；敘述臺灣法制時，用社區矯治。

除社區矯正者有四百一十一萬餘人，受社區矯正人的再犯率為0.2%，顯示社區矯正對於維護社會安全、節約刑事執行成本等，成效良好⁷。大陸的社區矯正法施行迄今，尚未滿一年，成效如何，值得觀察。

於此，正值政府大力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之際，實應重視社區矯治對於社會安全的正面功能；又，適逢大陸的社區矯正法問世，對於臺灣的社區矯治法制，或許能有借鑑。實務上，一直以來都有認為，散落的社區矯治規定，造成執法困擾，影響執法成效⁸；同時，恐怕也不利於確立社區矯治的立法精神與方向，連帶影響社區矯治的開展。以下，先扼要敘述社區矯治與社會安全的關係，再介紹大陸社區矯正法的立法重點，並提出對於臺灣社區矯治的粗淺建議。暫且不論大陸社區矯正的執法實況，在規範上，大陸的社區矯正法，應有值得臺灣借鑑之處。

貳、社區矯治與社會安全

社區矯治，是犯罪矯正的最後一哩路，銜接監所矯正與自由的社會生活。社區矯治是刑罰執行的方法⁹，運用非拘禁性質的處遇，讓罪犯提早返回社會，借助教育、扶助等措施，使之重新適應社會生活，開啟人生新頁；同時，對受社區矯治人施以適度的監管措施，以免人民對治安質疑或擔憂，且在社區矯治期間，如有違法情事，輕則警告，重則撤銷社區矯治，將之囚於監所。由此亦見，社區矯治兼有社會復歸與社會防衛的功能，有助於安全社會的建構。

社區矯治與政府的社會安全政策，密切相關；倘若忽略社區矯治，則社會安全的拼圖，將難以完整。自2018至2020年，行政院對於社會安全網的強化，三年投入近七十億元，以關懷家庭為出發，建設跨部會的服務體系，保護高風險家庭，照顧貧困弱勢家庭，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朝向單一窗口，整合社會扶助與福利服務，希望以家庭作為構築安全防護網的起點，藉此搭建完整綿密的家庭及社區支持網絡，修補社會安全的缺漏，控管影響社

⁷ 這是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完成社區矯正法制定後，在當日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發布會，由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愛立公布的數據資料。參見：新華網，體現中國特色 助力長治久安—解析新出台的社區矯正法，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2/28/c_1125399531.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05/20）

⁸ 林順昌，觀護再論，初版，2019年3月，4頁。

⁹ 蔡德輝、楊士隆，同前註4，401頁。

會安全的潛在風險¹⁰。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¹¹，家庭安全的積累，成就社會安全；面對弱勢或高風險家庭，及時關懷援助，應該可以避免潛在的社會危害。現在臺灣社會的組成，係以小家庭為主，且因邁入工商業社會，人民的生活型態改變，家庭關係不如往昔緊密，加上不婚或晚婚族群增加，以及日益嚴峻的少子化、高齡化等人口結構問題，更弱化家庭功能¹²，致使社會危害的潛在風險增加。整體而言，以關懷家庭作為社會安全網的根基，切中要害，值得肯定。

不過，關懷家庭偏向預防未生的社會危險，對於已生的社會危害，恐怕愛莫能助；此時，推動社區矯治，是比較合宜的解決方向。理想的社區矯治，以社會復歸為主，社會防衛為輔，運用監管、教育及扶助措施¹³，促使罪犯新生。社區矯治的對象，是犯行輕微的易服社會勞動或受緩刑宣告者，或犯行不輕，但服刑悔過而有再社會化可能性的假釋者。反之，若罪犯刑滿出獄，已與國家刑罰權毫無干係，國家對之持續關懷，則是社會福利或社會扶助的範疇。

社區矯治與家庭關懷，並非平行線，反而皆是關係密切的社會安全支柱。通常，受社區矯治人回歸社會的第一站，就是家庭。除非是四處流浪的辛苦人，不然總有遮風避雨的家，作為安身立命的處所，在其中休息身體、整頓心靈。家庭是個人社會化的重要場域，特別是童年時期，個人的思想意識、心理特徵、生活習慣、行為規範等，均受家庭影響深遠¹⁴。不諱言地，受社區矯治人的家庭，恐怕也是必須關懷的家庭。受社區矯治人的家庭，可能本來就有困難，又或其他的家庭成員可能嫌棄或懼怕受社區矯治人，或受社區矯治人感覺羞愧而逃避家人。如果受社區矯治人的家庭關係或環境未能改變，隱患仍在，問題難解。

可惜的是，當前政府強化的社會安全網，並未真正將社區矯治納入考量。行政院第二期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宜將社區矯治納入，方能使社會安全網更加周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陸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¹⁰ 關於政策面的內容，見：行政院，重要政策—強化社會安全網絡，<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6e7e91d8-483d-4b88-8501-7f787092e002>（最後瀏覽日期：2021/05/20）

¹¹ 傳統的「家庭」，具有婚姻、性別、血緣三項要件；且其可以是生產、分配的基本單位。見：王振震、瞿海源，社會學與台灣社會，3版，2009年9月，187-194頁。

¹² 同前註，200頁。

¹³ 此三者兼具，體現社區矯治的「綜合性」。參見：吳宗憲主編，社區矯正導論，2版，2020年11月，150頁。

¹⁴ 周新富，家庭教育學：社會學取向，初版，2006年3月，36-37頁。

民檢察院、公安部及司法部，於2003年發布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略稱2003年開展通知)之後，開始積極開展社區矯治，先在部分省市推動社區矯正，後於2009年全面試行。當時，大陸官方就清楚表明，社區矯正對於維護社會安全，具有一定作用，期望藉由社區矯正制度，結合國家與社會力量，提高罪犯矯正成效，避免罪犯再犯。兩岸社會文化相近，大陸的社區矯正法，或能啟發臺灣。

參、大陸社區矯正法的立法重點

大陸的社區矯正，自2003年開展通知後，歷經2004年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略稱2004年暫行辦法)、2012年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略稱2012年實施辦法)時期¹⁵。爾後，大陸在2019年底制定社區矯正法，2020年7月施行。大陸的社區矯正法，計63條，共九章，分別是：總則，機構、人員和職責，決定和接收，監督管理，教育幫扶，解除和終止，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特別規定，法律責任，以及附則。關於大陸的社區矯正立法，本文以為有以下四項重點，特別值得關注。

一、以社會復歸為目的

大陸社區矯正法第1條宣示，社區矯正的目的是在於，確保刑罰正確執行，以「提高教育矯正質量，促進社區矯正對象順利融入社會，預防和減少犯罪」。大陸社區矯正法是以復歸社會，作為法制建設的核心；同時，也被認為是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受社區矯正人採用寬鬆的非監禁行刑¹⁶。其實，大陸社區矯正法制以社會復歸為立法目的，是2004年暫行辦法時期，就已經決定的政策，該辦法第2條，已經昭告天下，社區矯正的目的是，矯正受社區矯正人的「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

以促進社會復歸為主的社區矯正，倘能有效執行，對於預防犯罪、降低

¹⁵ 在大陸，有時候為了政策需求，會先試行(試點)，從實踐中發現問題或需求，再充實法制內容。大陸的社區矯正立法，就是呈現這樣的特色。見：李傑清，中國大陸社區矯正發展的變革與展望—兼論相關創新作法對我國的啟示，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16期，2018年3月，40頁；王紀軒，兩岸社區矯正法制之比較研究，華岡法粹，66期，2019年6月，148頁。

¹⁶ 賴擁連，大陸地區社區矯正制度之探究：兩岸比較與啟發，刑事法雜誌，60卷2期，2016年4月，93頁；王愛立、姜愛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釋義，初版，2020年3月，15頁。

再犯率、維護社會治安，乃至於進一步落實修復式司法，都有正面助益¹⁷。不過，此並非意味著，國家漠視受社區矯正人的監督管理，而是國家的監管措施，與受社區矯正人之間，保持在一個合宜的距離。基本上，當受社區矯正人守法守規時，國家採用被動消極的監管措施，避免過度干擾受社區矯正人的新生活；反之，若受社區矯正人違法違規，國家才積極介入，一方面告誡受社區矯正人，應注意自身言行，另一方面，保障社會安全，以免有新的侵害發生。

同時，以社會復歸為主要目的的社區矯正，恰好可以明確區分其與監所矯正的差別。首先，監所矯正雖然也有教化功能，但礙於監所的性質，效果當然十分有限，更遑論協助受刑人再社會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畢竟，以監所將罪犯囚禁，僅能符合社會防衛的目的，無論短期或長期自由刑，對罪犯復歸社會的助益，均相當有限¹⁸。其次，監所的人力物力開銷，不容小覷，應當妥當利用。有限的司法行政刑資源，將可以確實用於刀口上，行刑成本可以節約，避免虛耗¹⁹。面對輕微罪犯，可以宣告緩刑實行社區矯正；面對嚴重罪犯，但經監所矯正後，對再社會化可能性高的受刑人，可以令其假釋實行社區矯正。

只是，以社會復歸為主要目的的社區矯正，說起來容易，但若無豐沛的資源支撐制度運作，恐怕流於紙上談兵。為此，除了大陸社區矯正法第6條，對於各級政府應將社區矯正的經費列入預算之外；同法第13條明文，國家鼓勵、支持民間參與社區矯正，以確保社區矯正能符合立法目的。前者是，社區矯正的經費保障規定，各級政府應確保社區矯正經費，包含工作、設備、宣傳、獎勵等，以免社區矯正成為無源之水，而難以為繼²⁰。後者則是，希望吸納民間力量，夯實社區矯正的基礎；但在實踐上，大陸也面臨一些問題，最主要是，鼓勵與支持社區矯正志願者（志工）的機制不足，加上沿海與內陸的經濟能力差距頗大，當然影響民間力量的投入²¹。

¹⁷ 蔡德輝、楊士隆，犯罪矯正新趨勢—社區處遇制度之研究，法學叢刊，45卷3期，2000年7月，47頁；染田惠，犯罪者の社会内処遇の探求—処遇の多樣化と修復的司法，初版，2006年8月，23頁。

¹⁸ 相關的批評，主要是認為短期自由刑，不僅無助於罪犯再社會化，反而可能因為監所環境，如受刑人在監所內結交惡友，對受刑人復歸社會產生不良影響；至於長期自由刑，可能使受刑人與社會脫節，並形成監獄化人格，如自主人格剝離、思想能力停滯、安全感喪失、附和監獄的偏差次文化等，同樣不利於罪犯再社會化。參見：林山田，刑罰學，修訂版，1992年2月，193頁；王皇玉，刑法總則，5版，2019年8月，633頁；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8版，2020年9月，51頁。

¹⁹ 吳宗憲，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的若干理論問題探討，法學評論，總149期，2008年6月，134頁。

²⁰ 王愛立、姜愛東主編，同前註16，46-47頁。

²¹ 王愛立、姜愛東主編，同前註16，86-87頁。

將民間力量引入社區矯正，在規範上的亮點應該是，大陸社區矯正法第41條，「國家鼓勵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為社區矯正對象提供就業崗位和職業技能培訓。招用符合條件的社區矯正對象的企業，按照規定享受國家優惠政策。」社會化的環境裡，除了家庭以外，工作場所是，個人離開校園後，最主要的生活場域之一²²。穩定且友善的工作環境，有助於個人社會化。對於受社區矯正人而言，工作能否順利，幾乎是社區矯正成敗的指標。對此，希望藉由鼓勵企業、社會組織，提供工作機會或職能培訓，解決現實上更生人就業較難的困境。

國家提供政策獎勵或優惠，吸引企業提供職缺，或從事職能培訓，是相當務實的作法²³。相較於國家，企業對於職業技能的培養，更具實益，因為企業比較熟悉職場需求，且訓練成本較低；又，若企業願意錄用受社區矯正人，無疑是成功復歸社會的一劑強心針。這樣的構想，是大陸過去試行社區矯正的經驗，所以2014年，大陸司法部提出「關於組織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對於企業捐贈物資、協助職能培訓或提供職缺等；若企業錄用受社區矯正人，得享受國家優惠政策。現在將當時的試行經驗落實在法律上，相信是有可行之處。

二、個別化的矯正方案

每位受社區矯正人，背後都有迥異的成長經歷、生活環境，因而造就各別不同的人格特質與人生故事。既然如此，社區矯正方案應該要對症下藥，即針對每位受社區矯正人的實際需求，量身打造一套專屬的矯正方案。基此，大陸社區矯正法第3條明確揭示，社區矯正「採取分類管理、個別化矯正，有針對性地消除社區矯正對象可能重新犯罪的因素，幫助其成為守法公民。」

社區矯正不應該是大鍋飯，面對不同類型或需求的受社區矯正人，需要建構個別化的矯正方案，落實「一人一案」²⁴。這樣的精神，表現在大陸社區矯正法第24條，「社區矯正機構應當根據裁判內容和社區矯正對象的性別、年齡、心理特點、健康狀況、犯罪原因、犯罪類型、犯罪情節、悔罪表現等情況」，先行評估，進而設計個別化的矯正方案²⁵，且「應當根據社

²² 周新富，同前註14，38頁。

²³ 這也反映出受社區矯正人的再就業，是比較困難的問題。見：張新民、劉遠主編，中國社區矯正制度與立法研究，初版，2019年1月，239頁；王愛立、姜愛東主編，同前註16，210頁。

²⁴ 王愛立、姜愛東主編，同前註16，130頁。

²⁵ 「評估先行」是大陸社區矯正的堅持。見：張新民、劉遠主編，同前註23，131頁。

區矯正對象的表現等情況相應調整」，才能有效實現「分類管理，個別化矯正」。簡言之，矯正方案是，個案上，對於受社區矯正人監督管理、教育幫扶的主要內容。雖然，受社區矯正人的社會危害性較低，但仍難謂無危害可能，所以在監督管理上，必須對受社區矯正人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才能擬定相關方案，有效預防再犯；受社區矯正人可能需要協助，所以在教育幫扶上，也必須對受社區矯正人有所理解，才能知道受社區矯正人的實際需求。

對於受社區矯正人的教育措施，大陸社區矯正法也強調個別化，即該法第36條第2款，「對社區矯正對象的教育應當根據其個體特徵、日常表現等實際情況，充分考慮其工作和生活情況，因人施教。」此與同法第24條相互呼應，亦是體現個別化的矯正方案。既曰教育，因材施教，誠屬當然之理；但實踐上，極不容易，除了執行社區矯正人員本身，需要具備專業，還要能夠理解受社區矯治人的狀況。執行社區矯正人員的專業能力，可以透過教育、考試、訓練等方式養成；可是，要讓執行社區矯正人員，真正理解各形各色的受社區矯正人，探求其實際需求，提出具實效的矯正方案，又必須持續觀察受社區矯正人的矯正變化，進而適時調整矯正方案，難如登天。

在2004年暫行辦法，大陸已經留意矯正方案應個別化；惟經多年試行，發現實際難處在於，如何在短時間內理解受社區矯正人，進而設計合乎個案需求的社區矯正方案。是故，2012年實施辦法第8條以下規定，要求設立專門的社區矯正小組；在小組之內，除了司法行政人員、社工²⁶、志工等外，尚包含受社區矯正人生活周遭的人，讓真正熟悉受社區矯正人的民眾，加入社區矯正的隊伍²⁷。

這樣的經驗，傳承於大陸社區矯正法第25條。原則上，每位受社區矯正人皆有與之相應的矯正小組，負責設計具體的矯正方案。如果受社區矯正人的情況單純，矯正小組的組成，可以簡單，以免浪費有限的國家及社會資源；反之，受社區矯正人的情況複雜，就極可能需要更多的相關人等參與矯正小組，才能設計適合受社區矯正人的矯正方案²⁸。基此，大陸社區矯正法第25條第2款，「根據需要，矯正小組可以由司法所、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人員，社區矯正對象的監護人、家庭成員，所在單位或者就讀學校的人員以及社會工作者、志願者等組成。」由此可見，矯正小組的組成²⁹，有矯正專業人士（司法所人員），受社區矯正人的親友舊識（監護人、家庭成

²⁶ 如何將社工與社區矯正結合，在目前的大陸，並非易事；其實，臺灣何嘗不是。見：郭偉和，*社工專門化和矯正專業化：如何實現社會工作與社區矯正的有機結合*，中國社會工作，2021年10期，2021年4月，47頁。

²⁷ 王紀軒，同前註15，155-156頁。

²⁸ 張新民、劉遠主編，同註23，166頁。

²⁹ 王愛立、姜愛東主編，同前註16，135頁。

員，所在單位或者就讀學校的人員），以及社會力量（居民、村民委員會人員，社工、志工等）。

值得一提的是，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也規定在大陸的社區矯正法中，但依該法第 52 條第 3 款規定，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應當與成年人分別進行」。畢竟，未成年人的心智發育尚未成熟，不宜與成年人等同視之。對於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同樣應顧及個別化，同前開條文的第 1、2 款規定，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應審酌受社區矯正的未成年人「年齡、心理特點、發育需要、成長經歷、犯罪原因、家庭監護教育條件等情況，採取針對性的矯正措施」，且矯正小組的組成，「應當吸收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人員參加。」

如果受社區矯正的未成年人，於社區矯正期間成年（滿十八歲），依大陸社區矯正法第 58 條規定，仍繼續執行正在執行的矯正方案，毋庸因受社區矯正人成年而另行規劃。畢竟，方才成年的受社區矯正人，不可能一夜長大，其實仍處於青少年時期，身心仍不穩定，維持未成年時的矯正方案，反而能貫徹該矯正方案的效能³⁰。再者，依本法第 55 條，對於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特別重視義務教育與職業訓練³¹，因為義務教育有助於培養人民的公民意識，瞭解自身的公民責任，且職業訓練能增進人民的就業競爭力，提高人民對於社會的適應。

三、避免發生歧視排擠

在社區矯正的過程中，若受社區矯正人，不幸遭遇民眾的歧視或排擠，甚至仇恨，復歸社會之路，勢必艱難。雖然《左傳》有言，「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是華人世界朗朗上口的金句，但現實上，有多少人明白知錯能改的可貴，同時又能兼具原諒他人犯錯的雅量。協助受社區矯正人順利復歸社會，可能必須在立法上，避免民眾對其歧視或排擠。

在方法上，可能有二面向，其一是，對受社區矯正人的身分保密，以免他人知悉而貼上標籤；其二是，適度保障受社區矯正人的權利，使其如同一般民眾就學、就業及生活。既然社區矯正，是為了促進受社區矯正人融入社會，就必須營造一個接納社區矯正人的社會環境。假如，受社區矯正人的身分暴露，周圍民眾可能心生芥蒂，甚至心懷恐懼，抗拒受社區矯正人，加以就學、就業及生活無法穩定，受社區矯正人可能自怨自艾，認為自己不適合社會，甚至萌生對社會的憎恨，反而使社區矯正的努力，前功盡棄。簡言

³⁰ 王愛立、姜愛東主編，同前註 16，281 頁。

³¹ 王愛立、姜愛東主編，同前註 16，266 頁。

之，隱藏受社區矯正人的身分，盡可能使之與尋常百姓無異，不只有助於生活重建，也能增進自身對於所屬社會的認同感，而有助於社會復歸。

基本上，大陸社區矯正的監管措施，國家是居於消極被動的角色，而係由受社區矯正人積極主動配合，如受社區矯正人對社區矯正機構，主動按時聯繫、提出遷居申請等。如果受社區矯正人無任何違法違規，執行社區矯正人員以外的一般民眾，根本無從獲知何人是受社區矯正人，所以合法合規的受社區矯正人，可以平穩回歸社會，毋庸擔心身分被公諸於世。惟少數的監管措施，國家會積極主動出擊，如實地查訪，所以大陸社區矯正法第26條第2款，「社區矯正機構開展實地查訪等工作時，應當保護社區矯正對象的身分信息和個人隱私。」藉此提醒執行社區矯正人員，在從事實地查訪時，應避免造成受社區矯正人的身分曝光。

前開規定，除了保護身分信息以外，也保護個人隱私。身分信息是指，能夠辨識受社區矯正人身分的資訊，如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等；個人隱私則是，受社區矯正人不欲他人知悉的秘密，如私生活、秘密通信、先天疾病等³²。也就是說，大陸社區矯正法要求，在進行實地查訪時，不僅是對受社區矯正人的身分保密，也必須保護受社區矯正人的隱私。因為，個人隱私與人格發展有關³³，一旦不欲他人知悉的秘密被發現，恐怕羞於見人，甚至產生憤恨。大陸憲法雖無隱私權的明文，但該憲法第38條以下，有公民的人格尊嚴、住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與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等，與隱私權保護有關的規定。基此，在大陸，「根據憲法」制定的社區矯正法，自應服膺憲法上對於公民基本權利的原則規範³⁴。

保障受社區矯正人的權利，使之無異於普通民眾，有助於其再社會化，是大陸社區矯正的實務經驗。對此，2012年實施辦法第36條，明確規範受社區矯正人的「人身安全、合法財產和辯護、申訴、控告、檢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利不受侵犯。社區矯正人員在就學、就業和享受社會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視」，就是反思2004年暫行辦法不足的成果³⁵。現在，這個成果落實在大陸社區矯正法第4條第2款，「社區矯正工作應當依法進行，尊重和保障人權。社區矯正對象依法享有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其他權利不受侵犯，在就業、就學和享受社會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視。」

此外，對於受社區矯正人的合法權益保障，規定在大陸社區矯正法第

³² 王愛立、姜愛東主編，同前註16，140頁。

³³ 司法院釋字第603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

³⁴ 王愛立、姜愛東主編，同前註16，19-20頁。

³⁵ 王紀軒，同前註15，155頁。

34 條第 1 款，「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應當保障社區矯正對象的合法權益。社區矯正的措施和方法應當避免對社區矯正對象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響；非依法律規定，不得限制或者變相限制社區矯正對象的人身自由。」這是對於受社區矯正人合法權益的一般規定，即社區矯正的執行者，應該保障受社區矯正人的權益；在執行社區矯正的過程中，監督管理的措施，最可能對受社區矯正人產生影響，所以應該留意，避免造成受社區矯正人回歸社會正常生活的負面干擾。又，同條第 2 款，進一步保障受社區矯正人的救濟權益，當發生受社區矯正人的權益侵害，受社區矯正人「有權向人民檢察院或者有關機關申訴、控告和檢舉」，以免受社區矯正人求助無門。

同樣地，對於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也應該注意其身分保密、權利保障，以免遭遇歧視或排擠。對此，大陸社區矯正法第 54 條規定，受社區矯正未成年人的身分資料應予保密，且「除司法機關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查詢外」，執行社區矯正人員不得向任何人提供該未成年人的相關資料；此身分保密的規定，顯然較成年人的社區矯正嚴格。又，同法第 57 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在復學、升學、就業等方面依法享有與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同樣也是希望，在回歸社會的道路上，勿對受社區矯正未成年人，造成任何阻礙或傷害。

四、有效應用現代科技

大陸社區矯正法有一重點是，「信息共享」法制化。過去，2012 年實施辦法第 35 條第 3 款，「司法行政機關和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建立社區矯正人員的信息交換平台，實現社區矯正工作動態數據共用。」現在，社區矯正法第 5 條，「國家支持社區矯正機構提高信息化水平，運用現代信息技術開展監督管理和教育幫扶。社區矯正工作相關部門之間依法進行信息共享。」大陸的社區矯正，正式導入現代科技。

信息化(informatization，或稱資訊化)，是當代的國家戰略，2006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布「2006-2020 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³⁶」，認為信息化發展，是國家發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選擇」。信息化發展的規模宏大，涵蓋各行各業，更是開展人工智能的基石³⁷。在信息化發展的思潮下，國家施政應展開電子政務，「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

³⁶ 關於該發展戰略的內容，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6-2020 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9-09/24/content_1425447.htm（最後瀏覽日期：2021/05/20）

³⁷ 關於人工智能的介紹，可以參考：王紀軒，人工智慧於司法實務的應用，月旦法學，293 期，2019 年 10 月，94 頁。

推進政務公開的有效手段。各級政務部門利用信息技術，擴大信息公開，促進信息資源共享，推進政務協同，提高了行政效率，改善了公共服務，有效推動了政府職能轉變。」此發展戰略體現在社區矯正上，就是社區矯正法第5條。

在信息化之下，相關科技應用於社區矯正的場景，主要是監管措施的「信息化核查」，以及使用「電子定位裝置」。在大陸的社區矯正法下，信息化核查是國家消極被動的監管措施，希望藉此不要過度影響受社區矯正人的生活，但有賴受社區矯正人的積極主動配合；使用電子定位裝置，即科技監控，是對於違法違規的受社區矯正人採用的監管措施，具有懲罰性質。

具體言，大陸社區矯正法第26條第1款，「社區矯正機構應當了解掌握社區矯正對象的活動情況和行為表現」；至於核實方式上，信息化核查是執行社區矯正人員可以運用的方式之一，且「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予以配合」。實踐上，信息化核查，是受社區矯正人主動在信息平台，定時提供自身的位置、狀況等信息（如手機定位、視訊通話等），供國家核查。掌握受社區矯正人的活動情況和行為表現，是社區矯正措施運作的基礎³⁸。譬如，廣東深圳，於2020年6月推出「深圳市社區矯正信息化核查暫行規定」³⁹，結合物聯網、生物辨識等科技進行監管，鼓勵受社區矯正人主動報告活動情況、行為表現；同時，深圳透過信息化核查，辦理線上課程等，發揮教育受社區矯正人的功能⁴⁰。

信息化查核的好處，不只是彰顯國家對於受社區矯正人的信任，更能夠節約執法成本，並且利用信息化科技，提升社區矯正的能量。試想，若受社區矯正人的活動情形和行為表現，必須由國家積極派員查核，勢必增加社區矯正的人力物力開銷；加以派員查核，未必有助於受社區矯正人的再社會化，因為受社區矯正人，可能是輕微犯罪而受緩刑宣告，也可能在監服刑期間表現良好而假釋，這些罪犯的危險較低、悔罪較高，既然未將之囚禁於牢獄，即是信賴該罪犯能夠重新做人，令其主動透過信息平台報告自身活動情形和行為表現，能使受社區矯正人感覺受到尊重與信任，反而有助於復歸社會。

科技監控的規範，在大陸社區矯正法第29條第1款，當受社區矯正人

³⁸ 王愛立、姜愛東主編，同前註16，139頁。

³⁹ 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圳，是大陸南方的科技、金融、物流等領域重鎮，應該是率先投入社區矯治法信息化核查制度建立的地方之一。見：深圳商報，深圳率先出台深圳市社區矯正信息化核查規定 http://duchuang.sznews.com/content/2020-07/14/content_2334646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05/20）

⁴⁰ 是故，學者有謂，考核除了監管以外，其實也有教育功能。參見：吳宗憲主編，同前註13，211-212頁。

有以下情形：「(一)違反人民法院禁止令的；(二)無正當理由，未經批准離開所居住的市、縣的；(三)拒不按照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被給予警告的；(四)違反監督管理規定，被給予治安管理處罰的；(五)擬提請撤銷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收監執行的。」經縣級司法行政部門負責人批准後，方能使用電子定位裝置，用以加強監管。是故，受社區矯正人於矯正期間違法違規，才可能依法電子監控；故2020年7月大陸社區矯正法施行前，執行社區矯正人員，忙將已接受電子監控的受社區矯正人，解除電子定位裝置，改以信息化核查措施。

電子定位裝置，是科技進步的產物，也是信息化科技的體現，特別是北斗衛星定位系統(BDS)在2020年盛夏開通⁴¹，更強化大陸科技監控的能力。又，科技監控設有期限，依同條第2款規定「不得超過三個月」，且「對於不需要繼續使用的，應當及時解除；對於期限屆滿後，經評估仍有必要繼續使用的，經過批准，期限可以延長，每次不得超過三個月。」畢竟，科技監控對受社區矯正人的生活影響較大，且全時段發送位置信息，亦侵害個人隱私，若無必要，實在毋庸強加於受社區矯正人。也因為如此，同條第3款，「社區矯正機構對通過電子定位裝置獲得的信息應當嚴格保密，有關信息只能用於社區矯正工作，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肆、臺灣社區矯治法制的規範建議

對照大陸的社區矯正法，可以為臺灣的社區矯治法制，提出些許意見。臺灣的社區矯治，並無專法，而是散見諸法，是否參考大陸，也邁向社區矯治專法制定，或可思量。社區矯治的實踐，首重妥當的社區矯治計畫，一旦計畫妥當，社區矯治的執行，有條不紊；同時，執行社區矯治應有充沛的人力物力，否則工作恐怕難以為繼。另外，在社區矯治上，科技監控(科技設備監控)是干預性較強的監管措施，現在應用於監控性侵害犯罪的假釋犯，業已多年，但若參酌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社區矯治的精神，或有改進空間。

⁴¹ 媒體稱，北斗衛星部署完成後，大陸擁有完全自主可控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將在國際上與美國GPS競技，且「北斗系統將在商業、軍事領域提供高精度定位等服務，在保障國防安全的同時，商業價值巨大。」見：經濟日報，大陸全球衛星導航開通，2020年8月1日A9版。

一、宜制定社區矯治專法

如果推動社區矯治，是已經確定的國政方針，則制定社區矯治專法，應該是無可迴避的方向⁴²。現今，臺灣的社區矯治，是嫁接而成，組合易服社會勞動、保護管束、更生保護等。可是，若分別觀察，便可知此「拼裝的」社區矯治，並非基於社區矯治的精神建構，其中個別制度的特性依舊存在，致使其與真正的社區矯治之間，仍存有相當差距，就算想要修法改善，也因涉及多部法律，恐怕顧此失彼，實非易事。既然如此，直接制定社區矯治專法，同時修正當前拼裝的社區矯治相關法律，不失為可行方法。

目前，社區矯治法制的問題，顯而易見。以易服社會勞動為例，其性質與社區矯治相同，均屬刑事執行的方法，設有一定監管機制⁴³，期待藉此令其回饋社會、反思己過；但是，易服社會勞動並無任何教化或扶助措施，且依更生保護法第2條，易服社會勞動人不是更生保護的對象，無法聲請保護，與真正的社區矯正，存有落差。另，以假釋付保護管束為例，其作為保安處分之一，非刑事執行的方法，性質與社區矯治相異，雖非完全沒有社會復歸的考量，惟其終究屬於保安處分，仍重在社會防衛，以監管措施為主。雖然，假釋人有更生保護作為回歸社會的輔助配套，但依更生保護法第3條規定，更生保護的聲請，是權利，而非義務，可能個案上的假釋人不願聲請，而無任何任何教育或扶助措施。

理論上，在社區矯治期間，對於受社區矯治人的監管、教化及扶助措施，三者同等重要，端看個案的受社區矯治人情況，據以進行調整；尤其，監管及教化措施，應當具有義務性。畢竟，社區矯治是刑罰執行的方法，國家刑罰權並未消失，仍有監管必要，以顧及社會防衛；但勿忘，理想的社區矯治，宜以社會復歸為主⁴⁴，教育與扶助措施才是主幹。因為，受社區矯治人是危險性低、再社會化程度高的罪犯，應藉由社區矯治，促使其回歸社會、自立新生，以符合社區矯正的制度目的；具有社會防衛性質的監管措施，應是輔助而已。

⁴² 同樣認為宜制定社區矯治專法的看法，如：張麗卿，社區矯正法制之比較法檢討—以德日法制為借鑑，月旦法學，279期，2018年8月，134-135頁；許華孚、賴擁連、黃俊能、陳佑杰、施柏州，成年犯罪人社區處遇效能之研究，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19期，2018年12月，70頁；林順昌，韓國社區矯正法制與實務論考，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3期，2020年10月，65頁；王紀軒，同前註15，171頁。

⁴³ 例如，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14點第2項第5款規定，「觀護人督導觀護佐理員協助執行易服社會勞動案件，觀護佐理員於社會勞動人履行社會勞動期間，協助追蹤社會勞動執行情況，到場訪視並填載訪查紀錄。」

⁴⁴ 張麗卿，同前註42，135頁

整體而言，臺灣的社區矯治，比較重視社會防衛⁴⁵，對受社區矯治人有程度不一的監管措施，卻未必有合宜的教育或扶助措施。又，更生保護法第11條的更生保護措施，兼含教育與扶助內涵，諸如輔導就學或就業，醫療機構必要的安置或治療，幫助維持生活的小額貸款等。不過，這些更生保護措施，反而是值得檢討的立法，因為當前具有教化內涵的保護措施，並非義務，都是權利，其實並不合乎社區矯治措施的構造。也因為如此，當前的社區矯治，與保安處分高度重疊，幾乎無異。

問題的源頭，大概是因為，立法者未曾站在社區矯治的視野，建構社區矯治的規範。舉例來說，保護管束、更生保護，無疑是當前臺灣社區矯治，最重要的制度。但是，保護管束出現於1935年的刑法、1963年的保安處分執行法，更生保護則出現在1976年的更生保護法；這些法律的制定，時間前後相距甚遠，且立法目的迥異，顯非立足於社區矯治的立法設計⁴⁶，現在卻不約而同成為社區矯治的骨幹，其中的矛盾或疏漏，在所難免。若臺灣要持續發展社區矯治，可能不能安於現況，應該通盤檢討，以社會復歸為主，社會防衛為輔，擘劃適合臺灣社會的社區矯治專法。大陸的社區矯正法制，自無到有，先後十餘年，一路摸著石頭過河，終於催生專法，其發展過程，或可啟發臺灣。

二、妥當的社區矯治計畫

社區矯治的成效，相當程度取決於社區矯治計畫。社區矯治計畫，重視個別化⁴⁷，一如醫師的處方簽，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大陸社區矯正法第3、24、25條等，對於社區矯治計畫，非常看重。妥當的社區矯治計畫，應顧及受社區矯治人的監管、教育及扶助措施。在此之中，監管、教育措施應具有義務性，畢竟受社區矯治人仍在刑罰執行期間，基於社會復歸與社會防衛的目標，應接受教育措施，服從監管措施；至於扶助措施，則視個別受社區矯治人的實際需求，以免虛耗社會資源。

在臺灣的現制之下，社區矯治計畫，幾乎等同於保護管束的處遇計畫。關於保護管束的處遇計畫，法律雖無明文，但可見於法務部執行觀護案件手冊（略稱觀護手冊）。觀護手冊是觀護人執行觀護業務的重要參考，其前身是2000年法務部發布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保護管束案件手冊，後於2003年修正發布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觀護案件手冊，由該手冊名稱可知，觀護人

⁴⁵ 鄭添成主編，觀護制度與社區處遇，初版，2013年1月，243頁。

⁴⁶ 林順昌，論保護管束、觀護處遇、保安處分及社區處遇之差別（一），法務通訊，2908期，2018年6月，4-5頁。

⁴⁷ 張麗卿，同前註42，136頁

的觀護業務擴大，不再限於保護管束，納入如執行緩起訴處分的義務勞務、戒癮治療等工作，但保護管束仍是觀護案件的重心。現行的觀護手冊，是法務部於2019年修正發布。

以一般案件為例，觀護手冊對於保護管束處遇計畫，要求觀護人「應於案件分案後3個月內擬訂分類分級處遇措施，嗣後至少每半年檢討修正1次；惟必要時，得視情況調整相關處遇計畫，已加強對重刑犯及累、再犯受保護管束人之監督。」其中，要求「分類分級」、「檢討修正」及「視情況調整」，應是彰顯處遇計畫的個別化。值得注意的是，觀護手冊修正前的規定是，觀護人於「約談或訪視受保護管束人二次後」的三個月內擬訂處遇措施，修正後改為「分案後」的三個月內擬訂處遇措施，可理解為現行觀護手冊更重視處遇計畫的擬訂，故將處遇計畫擬訂的日程提前，應值得肯定。

然而，處遇計畫是否符合個別化的需求，還是必須仰賴專業及合作。觀護人與受社區矯治人(即受保護管束人)素昧平生，要在分案後，快速藉由約談或訪視等方式，理解其受狀況，再依憑專業，提出處遇計畫。因此，觀護人的司法考試，除了法律相關科目，另有心理學、諮商與輔導等科目。然而，分案後三個月內擬訂分類分級的處遇措施，如果力求妥當，除了觀護人本身專業外，恐怕也需要他人合作，但是「合作」並非易事。關於合作對象，其一是，曾經與受社區矯治人互動的公務員。試想，在付保護管束前，其歷經偵查及審判，甚或曾經入監服刑，在社區矯治前的刑事司法程序上，與之曾有互動的公務員，若能將其發現的罪犯人格特質等稍加記錄，作為程序後端的社區矯治，觀護人就能夠掌握更多訊息，有助於擬訂更妥當的處遇計畫。

其二是，受社區矯治人身邊的親近人士，特別是家庭成員。理論上，受社區矯治人身邊的親近人士，較能理解受社區矯治人的心思及需求，若能與觀護人共同擬訂社區矯治計畫，或有助於受社區矯治人復歸社會。可惜的是，由觀護手冊觀之，擬訂處遇計畫，似乎是觀護人獨立作業，並無設立矯治小組的規定。目前實務上，若受社區矯治人的家庭成員願意，可以與觀護人攜手合作，成為協助個案復歸社會的重要力量；但是，若個案的家庭不聞不問，實在無可奈何。本文以為，立法上可以慎重考慮，將受社區矯治人的家庭成員，納入擬訂社區矯治計畫的小組。

在強調社會安全網絡，重視關懷家庭政策的當下，針對個案情況比較複雜的受社區矯治人，得要求其家庭成員加入矯治小組，與觀護人共同擬訂社區矯治計畫，使社區矯治更有實益；倘若個案聲請更生保護，則更生保護會亦應加入，共同研議。不過，若要受社區矯治人的家庭成員加入矯治小組，恐非觀護手冊可以規範。人情義理上，家庭成員與受社區矯治人共同面對，

協助伊人回歸社會，是情理當然；但在今日社會，應有法律規定，以合乎法律保留原則，且此有助於社區矯治成效，符合社會公益，具有正當性。至於個案上，家庭成員要達到何種程度的參與，不可一概而論，有待評估，但將家庭成員加入矯治小組的大方向，應該值得肯定。在制定社區矯治專法前，要解決此問題，可以考慮在保安處分執行法內，新增相關規定。

三、充沛的矯治人力物力

社區矯治的實踐，仰賴充沛的人力物力。畢竟，若無足夠的人力物力，社區矯治的監管、教化或扶助等措施，都難以落實。對此，誠如前述，大陸社區矯正法第6、13、41條等，均致力於確保社區矯正的開展，能夠建立在充足的人力物力之上。至於臺灣，社區矯治作為刑罰執行的方法，執行主體是檢察官；但實際上，觀護人才是執行社區矯治的靈魂人物，且相關資源的困乏，已非新聞。

以保護管束為例，其名義上的執行主體是檢察官，但實際由觀護人執行。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65、65-1條，執行保護管束時，檢察官「負隨時調查、監督之責」，向受保護管束人諭知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2條的應遵守事項；但實際「執行保護管束者」，主要就是觀護人。觀護人作為執行保護管束者，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66條，「對於受保護管束人，得指定其遵守一定之事項；受保護管束人不遵守時，得予以告誡，或報請指揮執行之檢察官為適當之處理」，其中指定受保護管束人遵守的事項，舉凡報到期日，是否接受團體輔導、心理測驗、就業促進活動等。

保護管束的教育及扶助措施，除了觀護人指定遵守的事項之外，端視受保護管束人有無向更生保護會聲請保護，若有聲請且符合資格，更生保護會方才提供教育或扶助措施。由「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與矯正機關、檢察機關及少年法院(庭)加強聯繫方案⁴⁸」可知，更生保護會與觀護人的關係緊密，當有受保護管束人向更生保護會聲請保護時，更生保護會應速與觀護人聯繫，以進一步瞭解該受保護人的需求，以便利更生保護措施的安排。

由此不難發現，觀護人工作繁忙，且此尚不考慮其他的社區矯治類型(如易服社會勞動。依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14點規定，觀護人負責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的執行作業，並督導觀護佐理員協助執行)，乃至於社區矯治計畫個案化的期待。然而，觀護人力短缺，是社區矯治實務的

⁴⁸ 該方案的目的是「為加強更生保護與矯正業務之銜接，及更生保護與觀護業務之連結，發揮更生保護功能，切實推展依法得受保護人之就業、就學、就醫、就養等保護業務，使其自得其所，自立更生，適應社會生活，重新做人，不致再犯，以維社會安寧。」

長久弊痛，實應擴大組織架構及人員編制，以增加觀護人力⁴⁹，自不待言。有論者計算，平均每觀護人每月241.4件⁵⁰，工作量之大，不難想像。平心而論，觀護人的員額，實在太少。

惟就當前政府財政情況，短時間內要將觀護人數提升充沛，恐怕不切實際，如何結合社會資源，應該是政策或立法上，可以思量的方向⁵¹；有關於此，大陸社區矯正法的模式，或可作為借鏡⁵²。此外，社區矯治的執行主體，應在立法上確立為觀護人。向來，檢察官作為刑事執行主體，似是金科玉律，但此應非不得更張，尤其在社區矯治的執行上，無人堪比觀護人。畢竟，觀護人的設置，自考訓乃至於實務工作，就是為此而生。觀護人成為真正的社區矯治執行主體，不僅切合實際，也可以減輕檢察官的負擔，讓檢察官將心力放在偵查及公訴工作⁵³。

四、科技監控的謹慎應用

隨著科技進步，科技監控運用在刑事司法程序，尤其是社區矯治，更是率先為之。目前，臺灣社區矯治的科技監控，用於性侵害犯罪的受社區矯治人，即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2項第7款，觀護人對於付保護管束的性侵害罪犯，經檢察官許可，得採取「對其實施科技設備監控」，並依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科技設備監控實施辦法（略稱性侵害犯罪科技監控實施辦法）執行。

又，依性侵害犯罪科技監控實施辦法第3條，科技監控是「運用工具或設備系統輔助查證受監控人於監控時段內是否遵守有關指定居住處所、禁止外出、接近特定場所或對象等命令，及蒐集其進出監控處所、監控時段內之行蹤紀錄等情形，並藉由訊號之傳送，通報地方檢察署或地方軍事法院檢察署。」國家利用科技，以較低的執法成本⁵⁴，掌握受監控人的行蹤，同時也是提醒受監控人必須注意自身行為，因其一舉一動都在國家的眼皮底下⁵⁵；

⁴⁹ 鄭添成主編，同前註45，23頁；蕭宏宜，社區矯治之政策與法制改革，東吳法律學報，27卷1期，2015年7月，3頁；張麗卿，同前註42，137頁；許華孚等，同前註42，70頁；林順昌，同前註42，65頁；馬躍中，我國刑事監護制度的現狀與未來，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25期，2020年8月，78頁。

⁵⁰ 林順昌，同前註42，65頁。

⁵¹ 馬躍中，同註49，79頁。

⁵² 賴擁連，同前註16，120頁。

⁵³ 類似的看法，參見：黃宗旻，我國觀護制度及更生保護組織重新定位之探討，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1期，2018年10月，43-44頁。

⁵⁴ 鄭添成，科技設備監控運用於我國社區處遇可行性評述，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4期，2005年3月，202頁。

⁵⁵ 關於社區矯治的電子監控實務與改革建議，可以參考：張麗卿、陳旻甫，電子監控實

於此同時，受社區矯治人的隱私等權益，遭受國家侵害，不言自明。

但是，社區矯治的科技監控規定，未明文於法律，而是在法規命令，恐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疑慮⁵⁶。例如，科技監控的執行期間，規定於電子監控實施辦法第6條第2項，「監控期間自檢察官許可之日起算，至受監控人保護管束期滿日為止。惟每三月須評估一次，若符合本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停止執行。」平心而論，此規定並不粗糙，但此與人民隱私權益等關係密切，至少應規定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而非該法的授權命令。

長遠來看，科技監控的擴大運用，應是時勢所趨⁵⁷。科技監控的運用，首見於2005年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後於2019年擴大至停止羈押的附條件之一，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5款規定，「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應「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並令授權訂定刑事被告科技設備監控執行辦法。現在，科技監控日益發達，加上人工智能的導入，科技監控的智能化儼然成形，應用場景也將更加豐富多樣，如避免老人或小孩走失，也可以運用科技監控防止。由此觀之，或可考慮直接制定科技監控專法，以期科技監控的實行，於法有據。

回到社區矯治，科技監控作為干預性較強的監管措施，侵害人民權益較大，宜如何運用，或許可以三思。基本上，受社區矯治人的危險性較低，但再社會化程度較高，可能是犯行輕微的罪犯，如緩刑付保護管束人，又或「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的罪犯，如假釋付保護管束人。對受社區矯治人，要採取干預性強或弱的監管措施，恐怕取決於社區矯治的政策定位，究竟傾向社會防衛或社會復歸。如果是傾向社會防衛的社區矯治，監管措施的干預性當然相對較強，以保障社會安全；傾向社會復歸的社區矯治，若非必要，不會採用干預性強的監管措施，而是相信個案自新，強化其回歸社會的動能。

誠如前述，當前臺灣的社區矯治，本質傾向社會防衛。以科技監控為例，其用於性侵害犯罪假釋付保護管束人，保護管束作為保安處分之一，目的在於保障社會安全，主動適用科技監控，作為保護管束的處遇方式，以免受監控人又誤蹈法網，自然可以理解⁵⁸。不過，理想的社區矯治，是以社會

務運作之難題與改革—以觀護人的深度訪談為核心，軍法專刊，58卷5期，2012年10月，29頁。

⁵⁶ 王紀軒，美國電子監控性犯罪者的經驗—以美國加州為例，世新法學，6卷2期，2013年6月，401頁。

⁵⁷ 同前註，405頁。

⁵⁸ 不過，有研究發現，監控時間超過三個月，「受監控者的順從度即會急遽下降」。參見：

復歸為主，反映在科技監控上，是否宜被動適用，給受社區矯治人更多的信賴與空間，促其自新自立，不無討論餘地⁵⁹。在社區矯治的監管措施上，除非有違法違規情形，不然應該避免使用干預性較強的監管措施。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科技監控在社區矯治的應用範圍，應該會日益擴大，而不限於性侵害犯罪假釋付保護管束人，或可考慮將科技監控，作為受社區矯治人違法違規，但情節尚屬輕微時的懲罰性監管措施。

伍、結語

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總統在就職演說時，便提及「我們的社會安全網還有很多破洞⁶⁰。」2018年，政府加大強化社會安全網的力度，試圖構築安全的臺灣社會。政府的用心，固然值得肯定，但可惜的是，社會安全網計畫欠缺社區矯治的身影，有如拼圖缺角，無法完滿。

臺灣的社區矯治，行之有年，促使許多罪犯回歸社會，重新自立生活，對於社會安全，貢獻巨大。不過，多年來，社區矯治仍深陷在二大泥淖：一是法規零散，造成執法人員不易施展拳腳，且難形成一致的社區矯治立法精神與方向；其二，社區矯治的執行中樞是觀護人，但觀護人力欠缺，無法反映實際需求，不僅讓社區矯治成效折扣，更是打擊觀護人士氣。對於前者，宜制定專門的社區矯治法，統一規範社區矯治的重要事項，確立觀護人作為社區矯治的執行主體；對於後者，宜擴大觀護組織架構與人員編制，可以考慮成立法務部觀護署。

2019年底，大陸完成社區矯正法的制定，恰好能讓臺灣反思，對於社區矯治，我們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大陸的社區矯正法，建立在社會復歸的立法目的之上，為了促進受社區矯正人順利復歸社會，重視個案差異化，強調量體裁衣，不同的受社區矯正人，應有不同的矯正方案；同時，為了促進社區矯正的效果，國家應確保社區矯正的人力物力充盈，積極吸引民間力量配合社區矯治的開展，避免受社區矯正人遭受歧視或排擠，並且運用現代科技，以提升矯治成效，節約執法成本。

回到臺灣，當務之急可能是，如何讓社區矯治法制，得以完善。立法

鄭添成，科技設備監控運用於我國社區處遇可行性評述，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4期，2005年3月，201頁。

⁵⁹類似的質疑，可以參見：蕭宏宜，同前註49，34頁。

⁶⁰總統府，第十四任總統暨副總統就職專輯，<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251>（最後瀏覽日期：2021/05/20）

上，應以社會復歸為主，社會防衛為輔。又，社區矯治能否順利發揮預期的效益，與社區矯治的計畫是否妥當，執行人力物力是否充足，有密切關係。如果社區矯治的計畫合宜，執行人力物力充實，受社區矯治人復歸社會的路途，將坦蕩平順；反之，倘若計畫欠周，資源缺乏，社區矯治執行辛苦，但效果卻是有限。總之，社區矯治的發展，應該是值得我們努力的方向；對此，無論是立法或執法，也都還有努力的空間。

參考文獻

書籍

- 王皇玉(2019)。刑法總則(5版)。新學林。
- 王振寰、瞿海源(2009)。社會學與台灣社會(3版)。巨流。
- 王愛立、姜愛東主編(2020)。中華人民共和國社區矯正法釋義(初版)。中國民主法制。
- 吳宗憲主編(2020)。社區矯正導論(2版)。中國人民大學。
- 周新富(2006)。家庭教育學：社會學取向(初版)，五南。
- 林山田(1992)。刑罰學(修訂版)。臺灣商務印書館。
- 林順昌(2019)。觀護再論(初版)。元照。
- 染田惠(2006)。犯罪者の社会内処遇の探求—処遇の多様化と修復的司法(初版)。成文堂。
- 張新民、劉遠主編(2019)。中國社區矯正制度與立法研究(初版)。世界知識。
- 張麗卿(2020)。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8版)。五南。
- 許福生(2010)。犯罪與刑事政策學(初版)。元照。
- 蔡德輝、楊士隆(2012)。犯罪學(6版)。五南。
- 鄭添成主編(2013)。觀護制度與社區處遇(初版)。洪葉。

期刊論文

- 王紀軒(2013)。美國電子監控性犯罪者的經驗—以美國加州為例。世新法學，6(2)2，377-412。
- 王紀軒(2019)。人工智慧於司法實務的應用。月旦法學，293，93-114。
- 王紀軒(2019)。兩岸社區矯正法制之比較研究。華岡法粹，66，143-181。
- 吳宗憲(2008)。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的若干理論問題探討。法學評論，149，133-139。
- 李傑清(2018)。中國大陸社區矯正發展的變革與展望—兼論相關創新作法對我國的啟示。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16，32-43。
- 林順昌(2018)。論保護管束、觀護處遇、保安處分及社區處遇之差別(一)，法務通訊，2908，3-5。
- 林順昌(2020)。韓國社區矯正法制與實務論考。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3，31-81。

- 張甘妹(1985)。論監禁刑的代替制度。臺灣大學法學論叢，14(1-2)，1-35。
- 張麗卿(2018)。社區矯正法制之比較法檢討—以德日法制為借鑑。月旦法學，279，118-138。
- 張麗卿、陳旻甫(2012)。電子監控實務運作之難題與改革—以觀護人的深度訪談為核心。軍法專刊，58(5)，29-60。
- 許華孚、賴擁連、黃俊能、陳佑杰、施柏州(2018)。成年犯罪人社區處遇效能之研究。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19，56-71。
- 郭偉和(2021)。社工專門化和矯正專業化：如何實現社會工作與社區矯正的有機結合，中國社會工作，2021(10)，47-48。
- 黃宗旻(2018)。我國觀護制度及更生保護組織重新定位之探討。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1，25-54。
- 蔡德輝、楊士隆(2000)。犯罪矯正新趨勢—社區處遇制度之研究。法學叢刊，45(3)，41-55。
- 鄭添成(2005)。科技設備監控運用於我國社區處遇可行性評述。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4，167-207。
- 蕭宏宜(2015)。社區矯治之政策與法制改革。東吳法律學報，27(1)，1-40。
- 賴擁連(2016)。大陸地區社區矯正制度之探究：兩岸比較與啟發。刑事法雜誌，60(2)，91-129。